

May 2016

The Principles and Significance of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Studies

Lili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Lili. 2016. "The Principles and Significance of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Stud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3): pp.23-3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3/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人文科学内部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的原理与意义

——以文学经典、故事和方法论等深度问题的汇合转换为中心

刘俐俐

摘要: 本文提出人文科学内部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的研究范式。本文以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三个范畴及其问题的深度汇合转换为个案,描述了文学经典范畴中如何阅读叙事文学经典的问题。此问题汇合到故事范畴,与故事范畴的两种故事涵义,以及接受者心理构筑的故事既依赖又超越特定文体和媒介的问题相汇合,转换为心理世界构筑故事的叙事文学经典阅读机制问题。此问题汇合到批评方法论范畴,应该融入读者阅读规律的叙述文学批评方法理论建设任务就提了出来。该任务凝聚了三个范畴各自历时共时经验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该个案描述、分析与概括,论文得出如下观点:深度问题汇合并转换为新的问题,是科学研究深化并获得发现的最好路径。其原理是:人文科学内部某领域或者范畴,需要不断提出新问题。新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有其内在机制,敏锐发现和尊重其内在机制与研究者的主观准备及选择的相互激荡,乃为研究范畴深度问题汇合并转换为新问题的理路和逻辑。该研究范式的意义:搭建了全新、具体,可施展问题的平台,借此平台可发现并提出以往未被发现的问题;用以汇合的范畴,既可看到原初的功能特质,也可看到共时态的功能特质,由此获得通向价值判断和评价的逻辑通道,这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性质相吻合。

关键词: 人文科学; 深度问题; 汇合转换; 研究范式; 文学经典; 故事; 方法论

作者简介: 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理论,近年研究集中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理论与实践工作。电子邮箱: liulili@nankai.edu.cn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ZD039],论文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Principles and Significance of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Studies

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It takes as its cases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literary canons, stor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ir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ition.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ew issue emerged from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esents a better approach to deepen the research because a new issue raised for any category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implies an internal mechanism which requires for deep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ssues so as to find a new approach and logic to the resulting issu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lies in its construction of a new and operational platform by which new problems can be revealed, and the category integrated shows both the original and the synchronic functional features.

Keywords: the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deep issues;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paradigm; literary canons; story; methodology

Author: Liu Lil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liulili@nankai.edu.cn

一、综合研究立场与人文科学内部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的提出

1. 什么是综合研究立场?

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描述了自然科学,“总有一个共同树干存在着。从数学到力学,然后到物理学,再到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人们今天要在人文科学中寻求类似的顺序,那是徒劳的”(155)。由此他指出,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会出现一种综合立场,即选择某一专门学科为基点,综合了其他学科,“而综合的专门学科,如果能这么说的话(而单是这样一种说法就表明这样一种假设的脆弱性),不是别的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当然带有综合的立场”(159)。皮亚杰指出,哲学确实可以与人的价值相协调,也可以与知识体系相协调,但是,如果采用综合立场,就有可能忽略了其他学科的各自目标,从而面临将其他学科都并入哲学领域的危险。这种现象,皮亚杰论述到社会科学时,采用了“还原主义”或者“兼并主义”来表述。他指出,“在一些社会科学里,确实存在着某些还原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兼并主义的倾向,因为所设想的还原一般都是按学者所代表的学科那个方向设想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些社会学家企图把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学等等”(156)。从皮亚杰的陈述和全书论述,可看出他对人文科学的综合立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还原主义”倾向忽略了各人文学科具体的研究目标从而消弭其特性的现象持批评倾向。可以推导出,具体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研究,则消弭了具体的时间和意义维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还原主义”倾向,则遮蔽作为“正题法则科学”(10)的各具体学科对于具体“规律”的发现和概括。

2. 综合研究对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虽然皮亚杰对人文科学研究的综合立场持批评态度。但如果从全域和宏观角度看综合研究立场,会有怎样的特点和意义?这值得思考。以个案为例来分析。我国近年出现的以赵毅衡教授为代表的基于符号学原理,以人类全域范围的叙述现象为对象,旨在探讨所有叙述体裁的共同规律的“广义叙述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广义叙

述学》。笔者以为,符号学研究和藉此诞生的广义叙述学,可视为人文科学综合研究立场的成果。广义叙述学如此综合人类虚构与纪实以及各种体裁叙述的研究立场,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曾经总结为:其一,“全域叙述分类、特性及规律概括,成为与叙述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参照系”。其二,“全域叙述类别的共时性排列,提供了各种叙述体裁和样式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系列性概念、术语的xx提出与命名”。所以,“确实具有知识学品格:客观描述、概念界定、逻辑论证及其周延系统所支撑的学科普遍必然性。[……]以知识形态为外显的成果体现”(刘俐俐,“小说”9-12)。可以概括地表述为:综合研究立场,为所有学科搭建了全域视野,看到从任何单一具体人文学科无法看到的全景图。具有提供方法和视角的价值。但需指出,笔者以为,符号学,从其原理和研究对象来看,应属于力求囊括遍及以追求规律和真实为目标的“正题法则”科学,即社会科学。以追求规律和真实为目标的符号学为基本原理,研究广义叙述学这样的既求真实亦追求意义与价值为目标的人文科学,则具有诸多困难。缘于在皮亚杰批评前提下笔者自己对其困难的发现和概括,因此,尝试地提出放弃综合研究立场,提出与之相逆的人文科学内部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的研究范式。

3. 人文科学内部深度问题汇合转换范式的涵义

皮亚杰虽然分析了综合研究立场可能的困难,但他坚信人文科学依然可以实行跨学科研究,那就是人文科学内部各问题的汇合。当然,主要是某些重大问题的汇合。这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广阔领域的各个分支中都能找到。而且由于这些分属不同领域的问题都有共同机制,所以,又与生物科学的结构、平衡和交流的机制相吻合,从而与生命科学问题具有姻亲关系(154-61)。这个看法极富有启发性:第一,生物科学的最中心、最专门的三个问题是:结构的形成、结构的平衡、机体与环境(自然的或其他机体)之间的交流。即具有自身形成与维护平衡和相互之间交流的机制。皮亚杰所以说人文科学与生物科学有姻亲关系,缘于通过研究他可以证实人文科学也具有结构的形成、结构的平衡以及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交流,所以,人文科学也具有生物科学的如此机制。探寻这样的机制就能够发现人文科学的某些特质。第

二,生物科学具有生长发展的过程,那么,由于姻亲关系,人文科学领域各个分支与其范畴也具生长发展的过程,这就与发生学观念与方法相吻合,自然符合对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历时性考察与研究。第三,进而言之,人文科学的任何范畴或者问题,随着研究深入和时代环境改变而改变,范畴与问题亦随之深入,因此,当某问题或范畴走到当下的共时态平台,特别值得关注与发现的问题得以凸显。在此基础上深度转换汇合就有了可能。

汇合与转换是怎样的关系?首先看,为什么会出现汇合。汇合机制在于,任何一个问题发展到当下,下一步的走向如何?与现实需求有怎样内在的关系?涉及相关的哪个领域的哪个范畴或者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两个领域的两个范畴或者问题的汇合。因此,汇合是对现实与理论问题发展的判断与回应的结果,是一个问题与范畴转换到另一个问题与范畴的机制。汇合业已具有此问题与哪个对象衔接并转换为另一个问题或者范畴的方向与路径。由此,可以推导出,某领域的某范畴或者问题的汇合与转换,需要至少两个以上数量的范畴或者问题,如此,方可成为“人文科学内部各问题的汇合”,即两个问题汇合后转换为新的问题。汇合是转换的基础,转换成新问题是汇合的必然。

“为什么提出此范式?”其实要求回答的是提出此范式的理由,此研究范式的意义或者价值。本论文最后一部分会予以回答。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种研究范式,笔者下面将以文学经典、故事和方法论三个范畴及其问题的深度汇合转换为个案,予以论证。三者分别具有各自历时维度经验和共时维度问题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每个领域都是内容涵盖非常广泛且极为复杂并有诸多问题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论文目标不是探究各自领域分别性的问题,只是为了更清楚地阐发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而将三者粗线条地逐一陈述与分析而已。

二、文学经典范畴与深度分析

1. 文学经典范畴业已成为问题域及新问题的提出

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是舶来品。西方的文学经典观念有着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经过

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的漫长发展过程。漫长的过程使之广泛涉及古典学、宗教等诸多学科。文学经典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也不是始于今日,这可从卡尔巴斯(E. Dean Kolbas)的《批判理论与文学经典》^①以及吉尔洛利(John Guillory)的《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生成问题》^②等著作中看到。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现实及发展关系最直接的关联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西方文学经典遭受到自由多元文化的质疑,八十年代出现了体制上的“经典之争”,九十年代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及其思潮影响到我国。我国学界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文学经典性质如何,建构的还是本质主义的?文学经典被经典化需要哪些外部和内部因素?如果将文学经典认定为生成的,其生成、功能、流变、拓宽和被消解的因素及规律如何?由文学经典建构性质,是经典化的结果,自然引申出如何被接受和阅读,以及如何读的问题等等。由于出现了如上相关联的问题,文学经典问题构成了一个问题域。^③在文学经典问题研究域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过程,既应放在共时系统考察它现时处境和价值,也应放在历时系统考察其经典化过程和原因。即便是共时系统的当代阅读理解问题,也是历时发展至今的集成,是共时与历时交织的现象与问题。这就将思路引向了具体问题:什么样文体的文学经典?当代读者还喜欢吗?如果说还喜欢,那么,与该文体的历史影响与积淀、与该文体容纳的内涵,其历史传承等有怎样的关系?与当下社会环境和人们精神生活特点、需求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是叙事性作品,读者读到的是什么?可见,这个提问显示出研究已经从文学经典本体性存在逐步转向了读者接受理路与逻辑。恰与近三十余年来接受主义美学思想被我国学界广泛接受相吻合,即从读者接受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学经典。

2. 读者如何读叙事性文学经典?

从文学经典具体到读者阅读叙事性文学经典,如何读就成为一个新的具体的问题。作家叙事性文体最主要的为小说,小说存在不同流派风格和书写题材的区别,但散文性、叙事性、虚构性和形象性等四个基本特性则是小说基本特性,对此学术界已有共识(李剑国 44-45)。其构成因素,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表述:“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出三个构成部分,

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最后一个因素即背景很容易具有象征性,在一些现代理论中,它变成了‘气氛’或‘情调’。不用说,这三个构成因素是互相影响互相决定的”(53)。虽说,就人物来说,有“心理性”人物观和“功能性”人物观的分歧和区分,但人物作为小说构成因素之一业已具有共识。确定小说如此基本特性和构成因素,就知道了小说的阅读机制。即必定有作家讲述的特点,即都有叙述主体讲述的人物和事件组成的有着因果关系的过程,展开故事这个陈述句。^④这就是叙述学“一次叙述”的概念。所谓“一次叙述”,叙述学界定为:“一次叙述化,简称叙述化(narrativization),发生于文本构成过程中。叙述化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narrativity),从而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赵毅衡 106)。浅白地说,作家叙事文体的小说讲述,目标是展开可看作一个陈述句的有趣过程,这个过程因为一般均具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有着因果关系的内在逻辑,所以,讲述的结果是一套话语,此话语显现为一个有趣的过程性的“故事”。因此,也可以说,“一次讲述”的结果,体现为可托载着一个故事的一套完整话语。比如,鲁迅的《故乡》就是鲁迅委托叙述者“我”讲述了一个故乡与返乡的故事。“一次讲述”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托载着“故乡与返乡”故事的完整话语系统(刘俐俐 240)。这就将阅读叙事性文学经典引向了故事问题。

将阅读叙事性文学经典引向了故事问题,其背后凝结了多方面文学观念及其相关学术思想的因素,分别为:接受美学的基本理念、文学经典建构性观念以及叙述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同时,其必然性逻辑为,由于故事范畴本身的复杂和丰富,所以,叙事性文学经典阅读问题就被放置在一个开阔的更大问题系统当中。问题的结构,由于汇合了故事,随之发生了变化,结构得以不断被重建。机体与环境之间交流,以激发其活力,交流是为了使作为结构的问题具有活力和深度,更有价值,以实现自身形成与维护平衡和相互之间交流的机制的自然倾向。这就进入了故事范畴。

三、故事范畴与深度分析

1. 作为学科划分的故事

人类口头讲述故事的历史非常久远,书面文

字讲述并述诸类文体的现象则更为纷繁复杂。可以说,作为活动的故事,始终与人类相伴随。那么,究竟是以话语、抑或以活动、抑或以被构筑的意义等诸多理解的哪种来界定故事?都有困难。所以,德里达说过,“‘故事’太让人糊涂了”(赵毅衡 120)。也许正缘于此故,涉及故事的学科非常广泛。理论地说,不可能全域性列数。但可大致分为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文学之内的有民间故事学、口头诗学、叙事学、中国叙事文化学等。文学之外涉及故事的学科和领域:有道德哲学、自由主义哲学、后现代理论、法律与文学、社会实用理论系统;作为质性研究之一的叙事探究、叙事伦理学等。^⑤这些与故事关联的文学之外的学科和领域,研究目标注定不为文学,但表明故事与人类具有最普遍性联系则毋庸置疑。那么,以故事命名的学科是什么呢?从文学内部来看,只有民俗学学科的民间故事学研究分支以故事命名。根本原因,还是缘于故事太难界定,故事问题太复杂。至于这些原因的具体讨论与表述,后面故事的深入分析部分将展开。

2. 一个理论假设:故事存在于听者与读者构筑的心像世界

笔者借鉴叙述学关于“一次讲述”的研究成果。即如前所说,故事可看作是作家委托的叙述者讲述出来的一个话语系统,即依托“一次讲述”而成的作为话语的故事。但是,在未被阅读之前,“一次讲述”不过就是一套话语放在那里。读者阅读顺着“一次讲述”的引导,将这套话语所指涉的过程、情节与其因果关系搞清楚,在自己脑海中再将其完整化为故事,这套话语才算得到实现,故事在读者脑海里成型了,有着落了。究其实是读者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这个理论假设,依托的乃为与“一次讲述”相对应的“二次叙述”。叙述学对于小说读者的阅读并获得阅读效果的活动,称之为“二次叙述”。“二次叙述”是读者角度切入的概念,渗透了接受美学基本观念与思想方法,打破了文本中心主义文论的束缚,是叙述学的重要贡献。必须说明:这个贡献主要体现于自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⑥从“二次叙述”概念,我进而称之为故事的“二次讲述”。即“一次讲述”的结果是构造好一个故事依托的话语系统,“二次讲述”是不断构造故事的过程。这就得出了一个初步看法:故事最终成型和实现于读者的心理世

界。或者反向概括为：文学经典就是读者“正在重读”（卡尔维诺 1-10）的文学作品，既然有重读，那么，一定有初读。无论初读还是重读，读者总是在脑海中一遍一遍地给自己讲述这个经典作品的故事。读者脑海中的故事就是文学经典最终实现的所在与依托。也可以说，作家委托叙述者“一次讲述”的故事对应于若干读者的若干次“二次讲述”的故事，由此，故事有了“一次讲述”与“二次讲述”的区分。故事存在于听者构筑的心像世界的原理即如上所述。

有一个最典型的证明故事存在于读者阅读心像世界的例子：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专著《鲁迅〈故乡〉阅读史》。^⑦藤井省三通过大量事实和数据，得出了一个基本看法，即在七十余年期间，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阅读这篇著名小说，总是将它首先读成一个故事，并总是有所不同的故事：知识阶级的故事；农民的故事；再次有所区别的分子的故事和小市民的故事等。^⑧

故事存在于听者与读者构筑的心像世界的理论假设，与此前关于“一次讲述”得出的文本话语托载着的故事概念，并行而成为两个故事概念，即作为“话语的故事”和“作为接受者心理构筑的故事”两个故事概念。两者各自界定的原理以及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其论证和阐述是笔者其他论文的内容。此处为了叙述故事范畴的历史过程和问题，将继续粗线条前行。

3. “故事存在于听者与读者构筑的心像世界”与文体和媒介的内在关系

“故事存在于听者与读者构筑的心像世界”，给出了从读者与听者，即接受者心理界定故事的角度，那么，可以说，只要接受者心里实现了故事的构筑，这个通过接受而心理构筑的故事，与哪种文体及媒介不具有必然性关系。换句话说，作为心理世界构筑的故事，具有超越媒介和文体的特性。所谓超越媒介，是指不受口头书面的区分与限制，所谓超越文体，是指不受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文体限制。由此，可以将其放在更大范围考虑。继而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故事不实存于文体，故事超越口头与书面媒介。

（1）接受者构筑的故事与具体文学文体没有必然性联系。

接受者构筑的故事是不实存于具体文学文体

的话语涵义的“故事”，即前述的“一次讲述”的那个层面的故事。此命题的涵义，是指接受者不与文体有必然性联系。换句话说，并不止和叙事性文体如小说有内在联系，也可以与其他文体有关系。这就涉及到体裁问题。从前苏联美学家莫·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理论体系来看，“艺术作为类别、门类、样式、品种、种类和体裁的系统”中的“体裁”，属于艺术系统最末位。^⑨叙述是伴随人类之始终的行为和现象，远在没有小说等文学文体之前就存在了。因此，书面文字媒介中，只要读者能将“一次讲述”理解并自己在脑海中给自己讲述了一个有一定场面、情节和人物相互关系的过程性世界，那么，就说明他已经获得了故事。区别仅在于复杂故事或者简单故事甚至故事片段而已。小说自不必说，即便叙事散文甚至诗歌也可读出故事或者故事片段。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读者显然可以读出诗人对未来某个时候老朋友相见情景的期待，包括想象中的情境、感情和思念等。当我们在一些小说阅读中没有产生明显故事感觉的时候，往往会怀疑这个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这个感觉说明，散文和小说乃至诗歌，都具有在读者脑海中构筑故事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只是构筑怎样的故事的区别而已。或者说，作为“一次讲述”的故事话语，无论依存于何种文体，都是接受者把握故事的最直接介质。

（2）接受者构筑的故事与文字没有必然性联系。

既然故事可作为话语，那么，故事就既可作为口头话语，也可作为书面文字的话语。无论倾听还是阅读这样的话语，接受者都有可能构筑心理世界的故事。这不需要证明，所以提出这个不言自明的命题，缘于由此可引申出一些重要看法：诉诸口头与文字的两种故事话语，故事话语编织逻辑和方式以及故事话语的含蕴，是否有些基本共同的特质？为了论证这个看法，有如下两方面论据。第一个论据是故事语法。西方以作家叙事文学为主要对象的经典叙事学三个研究理路之一，就是故事语法研究。而这个路径的研究资源就是来自民间故事理论。主要为俄国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学》。该著作从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抽出它们共有的模式，以便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

他总结的基本故事语法是:故事千变万化,但所有故事的结构总由7个角色组成。换言之,7个角色组成的结构可以说明所有的故事。当然,叙事学除了汲取普洛普的资源之外,还汲取列维·斯特劳斯、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等资源,直至普林斯正式地规范地表述作家叙事文学的“故事语法”(普林斯 216-17)。当然,说民间故事和作家叙事文学具有共同的基本故事语法,并不是说两者没有区别。罗兰·巴爾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等论著都涉及到了种种区别,可以说,全部叙事学的建设是在汲取民间故事语法和探究作家叙事文学故事语法的更复杂的诉诸形式的辩证中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故事语法,就是打通口头故事话语和书面作家文学故事话语的基本理论证明,也是接受者构筑的故事不与文字有必然性联系的一个证明。可以列出的另外一个证明是,我国宁稼雨教授倡导和组织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就是基于“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核包容的属性与特点”(宁稼雨 52)。因此,他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就是研究同一故事主题类型,在不同文本情节形态方面的异同等,比如王昭君故事,《明妃曲》等大量吟咏王昭君的诗文作品,与《汉宫秋》等叙事文学作品的王昭君故事,在题材上属于同一故事类型。这就超越了文学文体和口头书面的媒介。对于这种“同一故事类型的母题,从口头移动、传递到书面文学。进入书面文学后,继续移动、变异、渗透到其他作品乃至其他文体中。基于如是现象之普遍,笔者取其游走、移动、变异以及其蘑菇似极强生命适应力,将故事喻之为‘软传递载体’”(刘俐俐,“人类学” 394)。不用多举例,仅以鲁迅《故事新编》来看,即可验证。^⑩

4. 为什么仅仅民俗学中的民间故事分支以故事学命名?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及过的为什么仅仅民俗学中的民间故事学分支以故事学命名的问题了。

作为一套话语的故事与读者听者心中构筑的故事的两种涵义,决定了以往只是在话语层面考量故事,所以,在文字媒介中,故事在文体、题材,或者主题等角度的研究中被替代了。而民间口头故事,没有具体作者,也没有固定文本。缺少可以依托的作家和文体维度,故事研究范畴自然无所

附着,既无法附着在作家的某种文体上,也无法附着在某作家叙事性作品的所谓题材、主题等范畴上。且没有固定文本,始终处于流传变异之中,难说故事实体性存在,所以,只能以故事学称之。故事学名称本身的涵义,就含有没有固定文本而得以流传久远,不被历史淹没而消失的意义,凭借着听故事的耳朵,那些耳朵对此故事有兴趣,故事方可以存在。这就与前面论述的故事并不必然地依赖叙事性文体存在,故事不是实体性存在的看法吻合了。

总括地看,文学经典问题域中的文学经典重读以及如何阅读的问题,进入到故事范畴,与故事范畴的两种故事涵义以及接受者心理构筑的故事既依赖又超越特定文体和媒介的问题相汇合,汇合后可以合乎逻辑地转换为:如果把握了以心理世界构筑故事的叙事性文学经典阅读机制,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或者问:文学批评方法论应该如何汲取此机制,形成批评方法论的创新和突破?这样就将问题自然引导到方法论领域了。

四、方法论范畴与深度分析

1. 方法论的学科归属与具体化问题

一般方法论归属于哲学学科。方法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既然方法与目的相关联,所以,首先表现为仅仅是认识的样式。我国《辞海》的“方法论”词条说:“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各门具体科学还有自身的方法”(1545)。方法论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亚理斯多德《工具篇》所论为逻辑方法,培根《新工具》所论为古典归纳法,笛卡尔《方法论》所论为演绎法,黑格尔《逻辑学》所论为辩证思维的理性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为唯物辩证法。

作为哲学学科的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为:方法的对应性和两极否定性原理,方法的层次性原理,方法的互补原理等。^⑪

缘于方法论的对应性、层次性、互补性等基本原理,更缘于方法就是关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我运动的形式意识,所以,方法论必定走向研究对

象所属学科而具体化,如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每一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都趋向于制定自己的认识论。由此有了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以及人文科学方法,虽然三者方法具有互相渗透、影响和融合乃至借鉴的机制。让·皮亚杰的《人文科学认识论》还非常细致地叙述了三个大的科学领域认识论的关系。但是,具体化是分层次性的。以此,“人文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地位和方法论问题”(21)。具体到作为人文科学覆盖之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2. 具体化取决于研究目标和问题

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如何具体化?朝哪个方向或者趋势具体化?一般方法论的对应性原理告诉我们,应根据研究对象而具体化。回顾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方法论热,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著作。代表性的如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赵宪章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问题》,胡经之、王岳川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⑫这些著作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对此,可以理解为这是我国从传统的一般批评方法向西方美学文艺学新思想新思潮寻求借鉴,发展出具有创新性拓展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顺着如此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走向,根据各种文学文体的自身特质,并与之对应,适合具体文学文体特质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方法论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这就具体涉及到叙事性文学作品研究及方法。三十年来对于西方叙述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语义学、民间故事形态学、小说修辞学等关联程度不一的诸多理论的介绍,可以理解为遵循与叙事性文体的具体化特点对应的理论与方法。仅以小说批评理论与方法论来看,出现了既往我国在叙事性文体如小说方面所没有的理路与方法,如既汲取了我国古代话本等叙事性文体的资源,也汲取了西方关于艺术形态的概念和思路而产生“小说形态学”的研究范式,这就是研究创新与具体化的一种选择。如鲁德才的《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艺术形态学导论》,他的基本思想是,古人把具有说话艺术性质的文本当作小说,虽说到了明代,转化为书面阅读小说,但仍未改变说书体的性质,其形态依然基本为说与听的审美关系。由于说与听的审美关系,

导致了我国小说传统中始终含有表演艺术的“说”的特质,与之对应的接受者,则主要诉诸于听觉。这截然不同于纯粹的书面文学。由此也决定了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话语、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的特殊性。这就从小说形态角度重新理解和界定我国白话小说传统了。回顾我国白话小说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史学研究,郑振铎、孙楷第、谭正璧等为代表的考证、文献学研究,文体学、语言学研究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理论分析性质的研究等各个阶段。目前除了形态学研究之外,也已有学者从与形态学相似又相异的交流诗学研究路径进入我国肇始于说书体小说研究,并最终落脚在“交流叙述学”。“交流叙述学(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以文本内、外‘双循环交流’为研究内容搭建交流叙述的研究框架,其研究对象即为所有叙述类型中叙述交流的内在交流与运行机制,同时将这种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之中”(王委艳 126)。所谓的小小说形态研究和叙述交流学研究,虽然尚不能为成熟研究范式,但其从求文本之真,进而到文本形态,再到文本之外接受实现的机制即交流的特质的思考趋势,却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会问:为什么近些年来出现了小说形态学研究范式和交流叙述学的理路?毋庸置疑的与汲取和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的从读者阅读接受以实现文学价值的文学思潮及理论密不可分。

研究范式向读者接受方向倾斜,合乎文学研究的人文历史科学性质,也可理解为更趋向于人本身。用皮亚杰的话说:“我们把那些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之为‘人文历史学科’:它涉及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过影响的个人,这一类人的著作,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技术与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各种制度,经济及其他交流,以及整个文明。历史包罗一切与群体生活有关的东西,既涉及社会生活的可分离部门,也涉及它那些相互依存的方面”(4)。从前面梳理的白话小说研究范式的历史,可以看出来,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其实也有“正题法则科学”探求“规律”的方面与任务,如搞清楚版本真实情况,文学文体发展规律,文学总体发展的规律、文学创作的规律等。概而言之,这些都属于以

事实认知为主要目标的一面。即便是这一面的任务,其成果也难以如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量化地评价。另一面,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又具有“应该是”(sollen)特质,即具有价值属性。所以,是规律与价值相互结合缠绕的研究范畴。因为文学对人类有用,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与有什么用、价值如何等问题联系。

可否将叙事性文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的趋势概括为:从对文学文本版本等客观存在的真实状况研究范式逐步转向对文学文本的叙述方式、文体特性、文本特征等的研究范式,再到从文本之内转向文本内外相互联系的研究范式。这个不断走向具体的变化趋势,自然地显示出,叙事性文学作品特性与读者接受特点相关联,同时也与动态变化的时代需求等环境性因素关联,因为,一个人文学问题的结构,其机体与外在环境有着必然的交流,唯其如此,这个问题才是活动的而且有活力的。这是方法论领域为深度问题汇合准备好的平台。

叙事性文学经典阅读,与读者以脑海中构筑一个故事为接受特质相结合的问题,走到了文学批评方法论,但又不是单纯的或者说传统的批评方法论,而是读法和批评方法论的融合。这显示出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和研究的方法论应该融入读者阅读规律。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批评方法论呢?这是一个研究课题。

需要说明的是:如上文学经典、故事和方法论历时性发展和基本观点的陈述辨析,严格地说,分别是三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其背后都有若干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的细致论证,是笔者本人业已完成和正在完成的任务。此论文中只能粗线条呈现。目的是为了以此三范畴问题的深度汇合转换为个案,研究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五、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诸范畴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的合理性、可能性、基本原理与意义

1. 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诸范畴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三个范畴深度汇合有怎样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最后落脚于怎样的问题?或者问,可以在怎样的问题上有所突破?大

致可概括如下:

文学经典问题域形成与研究问题展示与走向,逻辑地显示了文学经典的建构性质,由建构性质必定推导出读者阅读文学经典,是文学经典建构因素之一与建构过程的一个侧面。因此,读者阅读及如何阅读,成为该问题域的突出问题。具体到阅读叙事性文学经典,则会引出哪些问题呢?这就将问题传递给了故事问题。

故事范畴在广泛的所涉学科相互关联性的梳理中,形成了开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多学科的历史性梳理、分析与探究,得出了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故事具有两种涵义,即话语涵义和接受者心理构筑结果的涵义。其二,沿着故事作为接受者心理构筑结果的涵义,可推导出故事超越于文学文体,也超越于口头与书面诉诸形式。缘于故事具有基本的故事语法,故事本体与故事素方可以传递于口头与书面文学之间。作家叙事方可在基本故事语法的把握中施展腾挪。当文学经典问题域将读者阅读及如何阅读作为问题提出时,自然与故事研究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产生的基本观点相汇合,由此,深入地提出的问题是,读者阅读叙事性文学经典,与其文本承载的故事话语有怎样的关系,或者文本承载的故事话语对于读者在自己脑海中构筑故事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影响?这是顺着读者接受理路所提的问题,但此问题的另一侧面则是,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互为联系,文学批评关联着作品,也关联着读者阅读规律与特性,所以,文学经典阅读向故事提出的问题,以及和故事问题汇合后,继而向文学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显示出方法论一般原理与具体批评对象的方法论的结合趋势。由此,面对叙事性文学经典这样具体对象的方法论问题得以提出。即文学研究方法论需要兼容读者的读法和批评方法两方面,使之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表述为,以读者阅读特点为基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是怎样的?这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最新问题。

如上陈述和辨析,显示出三者是不断递进、层层深入并最终落脚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

2. 基本原理

以上以个案方式阐述了诸范畴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那么,该具体个案所代表的范式,

其原理如何? 任何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结构性存在, 关于结构, 皮亚杰认为有产生、平衡与交流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结构的产生以两种形式出现即形成与变化, 其中第二种只是第一种的结果”。第二, “就形成中的结构而言, 结构的自动调节不再归结为标志着完成结构的那一整套规则或规范”。第三, “就正在构成或继续重新构成的结构(如生物结构)而言, 交流不再限于内在的相互交流, 如同在一个完成结构的各亚结构之间的交流那样, 而是带有相当大一部分与外界的交流, 作为结构运转不可缺少的供给”。质言之, “一个活的结构构成了一个‘开放’系统, 也就是说, 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皮亚杰 163-64)。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具体领域的问题, 作为一个结构, 它一旦形成就要求不断地自动调节, 其调节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与自身之外的诸领域的相互交流, 所以, 跨学科研究具有必然性。所谓跨, 是指通过超越原有局限范围而实现交流, 交流是目的, 至于跨越哪些范围, 根据交流以实现结构获得调节为目的。本论题所跨越的范围, 没有超越文学之外, 但实现了通过问题汇合转换, 问题不断深入, 问题的结构始终具有活力。这就体现了结构形成、结构平衡以及与交流环境的交流特质。

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的基本原理, 可以概括为: 缘于人文科学内部某领域或者范畴的深入问题需要继续提问, 如果跟着问题走必然出现跨学科。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范畴, 这由问题作为一个机体的自身特质所界定。至于留在哪个领域与范畴, 则由研究者主观所决定。这体现了科学研究跟着问题走的特点, 也体现了问题始终在路上的规律。

那么, 为什么说问题停留在哪个领域或者范畴, 是研究者主观决定的呢?

一般科学方法研究论有一个基本定理: 想要预先正确地判断一个问题的价值是困难的, 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最终的判断取决于科学从该问题得到的获益。^⑨所以, 任何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 对某些领域和范畴以及哪些问题有价值均具有研究经验、敏感和学术灵感。从这点看, 判断确实为主观性的。但同时, 一个问题向哪个方向前行, 可否与另一个领域范畴汇合, 也并完全取决于主观, 从问题发展的客

观规律来看, 问题汇合需要内在机制, 机制自动地潜在地制约着问题的汇合。如果不具有某种机制, 即便研究者主观选择, 也无法前行。或者说, 某领域的范畴, 有其自动趋向于另一个领域或者范畴的内在特性。这个特性与研究者主观准备相互激荡, 汇合与转换就发生了。

3. 深度问题汇合转换研究范式的意义

其一, 由于搭建了全新、具体、具有可施展问题的平台, 在此平台上发现了以往未发现的问题, 并提了出来。

所谓“以往未发现的问题”有三类, 第一类是最终的作为学术目标的问题, 比如本论文所阐述的个案, 最终学术目标是: 兼容读者读法和批评方法两方面的批评方法论, 或者表述为以读者阅读特点为基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这是叙事性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最新问题。第二类是每个领域或者范畴的问题与另一个领域或者范畴汇合转换的问题。第三类, 前面论述中尚未涉及。现在依然以个案的内容为例说明: 故事范畴研究阶段, 由于重读文学经典以如何读向故事范畴提出了问题, 所以在问题汇合之后, 即如果说读者接受叙事性文学经典, 体现在读者通过“二次讲述”给自己一个故事来实现的话, 那么, 这个涵义的故事如何界定呢? 当然由读者心理构筑的故事的涵义层面界定, 但就读者心理构筑的故事进一步提问: 是情节和人物命运等展开的客观过程呢? 还是读者构筑后提炼出的故事寓意或者意义? 这个提问的深层是文学观念、审美接受心理理论与文本理论共同合力方可解决的。其实, 研究小说艺术的学者曾经以小说的指涉论角度提出过此问题。认为“语言和语言的意义之间所有的, 只是似是而非的关系, 寓言和寓意、小说和小说的指涉之间, 也存在着流动不居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张大春 62)。该论者举了《伊索寓言》中的《燕儿和其他的鸟儿》的故事: “榧寄生草发芽了, 燕子担心这种草对鸟儿有害, 就集合所有的鸟儿, 要大家合力把榧寄生草从橡树山砍掉, 如果没有能力这么做, 就到人类那里去, 请求他们不要用榧寄生草做粘胶来捕捉鸟儿。鸟儿都笑燕子胡说八道。于是燕子只好自己到人类那里去请愿。人类认为燕子很有智慧, 就留下燕子和人类住在一起。从此以后, 其他的鸟儿都遭到人类的捕捉, 只有燕子受到保护, 并且可以安心地在人类的屋檐下筑巢”。那

么,这个故事的寓意果真只是“眼光看得远的人可以幸免于难”吗?还是“眼光看得远的人注定将背弃同类”?还是“眼光看得远的人注定将出卖同类间的秘密,依附较高的权力”?还是“人类欣赏能出卖同类间的秘密以依附较高权力的物种”?还是“神欣赏眼光看得远且能背弃同类、出卖同类间秘密以依附较高权力的人”?这些看来似乎既不更接近也不更远离真理的寓意还可以无限延伸、扩充;它们所带来的教训未必比伊索原先的高明或者逊色(张大春 59-60)。既然呈现出来的问题会很多,那么,选取哪个问题研究,则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课题和走向所决定。

其二,深度汇合是在历时经验维度积累的共时平台上的实施。历时维度携带发生的原因,由此,用来汇合的范畴,既可看到原初的功能特质,也可看到共时态的功能特质,由此,获得了通向价值判断和评价的逻辑通道。这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性质相吻合。

论文已经显示了此种不断向具体深入问题前行的研究范式。表面看,与综合研究立场恰好相逆。但是,笔者看到,持综合研究立场的人文学者,缘于其人文情怀和研究目的,他们最终也自然地走向具体深入。笔者欣喜地发现,赵毅衡教授领衔的符号学研究,以《符号学》为代表,建立了一个可用于分析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体系之后,已经正在发表和出版若干分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科性符号学著作。^⑭这个现象表明,虽然符号学这样的综合研究立场,似乎以符号学原理和方法囊括所有人类的符号现象及其规律,但毕竟符号所涉领域既有社会科学、也有人文科学,更有自然科学,所以,只有更具体到某一领域,才能使该领域有更恰切的符号学理论与方法。这就是我们从这些分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科性符号学著作中看到的,既有人文学科的符号诗学、音乐文化符号学、名墨符号学、艺术符号学、名流符号学等,也有社会科学的社会符号学等。这些著述所论述的则为一般符号原理基础上更深入一层的规律及其理论方法了。笔者以为,这是综合研究立场之后的分层次分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此路向和趋势,从另一极证明了笔者此论文的理论设想及合理性。

注释[Notes]

- ① E. 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Literary Canon*.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1.
- ② 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③ 参见刘俐俐:“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南京社会科学》3(2013): 137-43、150。
- ④ “故事这个陈述句”是“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的套用性说法。“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出自罗兰·巴特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德寅译,转引自张德寅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7。
- ⑤ 详见刘俐俐:“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2014)。
- ⑥ 详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06-19。
- ⑦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日本创文社,1997年)。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中文版),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 ⑧ 详见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中文版),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73。
- ⑨ 详见(苏)莫·卡冈:《艺术形态学》,《第九章:理论》,凌继尧、金亚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 ⑩ 参见刘俐俐:“鲁迅《故事新编》故事与小说的人类学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2013): 103-11。
- ⑪ 此三条方法论基本原理,笔者借鉴了陈鸣树著作:《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的上篇“方法论:原理”的概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27-57。
- ⑫ 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⑬ 参见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陈捷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 ⑭ 这些著作分别为:段炼:《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孟华:《汉字符号学简论》;唐小林:《符号诗学》;陆正兰:《音乐的文化符号学》;胡易容:《图象符号学》;伏飞雄:《艺术符号学》;祝东:《名墨符号学》;饶广祥:《广告符号学教程》;文一茗:《主体符号学》;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宗争:《游戏叙述符号学》;冯季月:《社会符号学》;魏伟:《体育符号学》;闫文君:《名流的社会符号学》;彭佳:《生态环境符号学》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

-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Trans. Huang Canran and Li Guim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6.]
-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 [Cihai Editorial Board. *Cihai*.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ress, 1980.]
-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 [Fujii, Shoz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Lu Xun's My Old Home*. Trans. Dong Bingyu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02.]
- 刘俐俐：“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符号与传媒》2(2015)：1-16。
- [Liu, Lili. “General Narratolog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Signs & Media* 2 (2015)：1-16.]
- ：《小说艺术十二章》。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
- [——. *Twelv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变异与永恒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2014)：392-404。
- [——. “The Variations and Eternals of Stories from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2014)：392-404.]
- 李剑国：《古稗斗筭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 [Li, Jianguo. *Gubai Doushao Lu*.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2.]
- 宁稼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2010)：50-54。
- [Ning, Jiayu. “Mu Zhai's Research on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New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2010)：50-54.]
-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 [Piaget, Jean. *Epistemology of Human Science*. Trans. Zheng Wenb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9.]
- 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Trans. Qiao Guoqiang and Li Xiaod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 Liu Xiangyu, Xing Peiming, Chen Shengsheng & Li Zhemi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王委艳：“交流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2014)：126-31。
- [Wang, Weiyan. “The Basic Problems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1 (2014)：126-31.]
- 张大春：《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Zhang, Dachun. *Genres of Fictio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 [Zhao, Yiheng. *General Narratology*.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责任编辑：王嘉军)